[xvii]

初版導言[4]

本書之首要目標，在於釐清一份中國文獻之真實性質。該文獻今有兩種殘卷存世，皆見於大英圖書館斯坦因漢文寫本專藏。其中篇幅較短者爲 S.2658。早在 1927 年，因矢吹慶輝於其論三階教之名著中刊佈其注解本，學界遂得以識其梗概。另一殘卷 S.6502 篇幅則遠超 S.2658，近年來始略受關注，然尚未見刊佈。

初看即可斷定，此爲 7 世紀末所出之政治宣傳文書。學界曾多予致力，以求確定其撰作年代，並辨識其作者。然因種種誤解迭生，此文之本來面目，至今尚未獲得應有之“辨識”。筆者認爲，凡欲嚴肅論武周（690~705）之佛教與諸種思想形態，當由此文獻爲起點，必多有成效。是故於治事之初，當宜刊佈 S.6502 並附其全譯。其校勘本及英譯刊於本書下編。譯文之注腳，僅求限及要點；蓋余並不欲對此文獻之總體詮釋立一家之言，而務在補足必要之事實脈絡，使此文不至流於浮空。所附注解，意在使讀者得見此文深浸於當時之歷史現實，而此文獻實乃對彼現實之詮釋與再現。

然既爲一種再現，則若脫離當時之社會土壤，則無甚利用價值。可以說，其價值正在於促使我們追索其所脫胎之複雜現實，使其所表達之精英階層之上層結構，得到合乎邏輯之梳理。實則，當時諸種主要之思

[xviii]

想形態（儒、法、佛、道），不論其精英或民間形態，在其中皆有呈現。乍觀或嫌雜糅，然細讀自明其故。縱不明其性質，亦能察覺此文書之旨在於爲武曌篡奪政權招攬最廣泛之支持。故如凡此類以宣傳爲首務之文

4 本書初版漢語撰寫使用威妥瑪拼法（Wade-Giles），第二版改用拼音，並訂正誤拼。

書，兼引諸家理念者，僅屬策略之需耳。

恰巧諸部儒家史籍述及此段歷史，皆強調 690 年武曌革唐立周之際，有一文獻曾發揮極爲關鍵之作用。凡閱儒家史籍而至此者，自不免心生探求一番之衝動，此文究竟有何載述？作者又是何人？

而不巧，武曌向爲正史不易處理之人物。自其身後武周實錄纂修之時，史家異議即已紛然並起。著名之《史通》作者劉知幾（661~721）正是在彼時，與同僚多所諍論。然當時所成之實錄，今皆亡佚。10 世紀《舊唐書》之編撰者對武曌已屬嚴苛，《新唐書》之作者則較之又甚。以是不免令人生疑，正史之所述武周之事，或已乖失真相；至於其他重大事件，則更付之闕如。故今日學界中力圖重評武曌之政略與角色者，頗值得我們報以極大之關注。論武曌，宜著眼於其政治品格，而非流於其私情與宗教信仰之瑣事，後者無確鑿史料可徵。實質問題在於探明武曌於當時政治鬥爭中所代表什麼？體現何種勢力？其作爲又何以長久主宰現實？佛教及諸家思想形態，亦宜於此一視域下加以考察。欲解答此諸疑問，尚須詮釋大量文獻，而其中多數頗難解讀。

是以於此略舉若干文獻，以作初步引介與討論。

第一章提供若干線索，指出儒家史書所載、似已永佚之文獻其實大 **[xix]**
抵保全，數十年間唯待學者從諸層面加以辨析。第二章力求辨明此文獻之作者，並將手頭相關資料，撮爲一有機整體。蒐羅此等資料可發掘文獻諸作者其人及社會身分，並藉以推求文獻編纂背後某種運作之主要受益者。既言是主要受益者，則亦有他等人物乘之獲利。誠然，若僅作者及其所屬群體得以因時局之變而受利，此文後來不至如此成功。日後或值得一探——筆者頗以爲然——凡因武曌權勢之鞏固而可得利者，是否皆爲作者之天然同盟。譬如關於唐代社會流動之研究表明，7 世紀後半葉，其勢尤爲顯著。又，當時政治派系之互爭異常激烈。武曌權力漸進所遇之各種障礙，實關乎門閥大族及科舉之士的利益衝突，後者正於此際在政壇始獲要角。武曌之私志適與科舉官僚之利益相合，故而扶植其

勢，使之成爲其統治之政治基礎。即便此說與陳寅恪所倡、眾學者所從之“關隴、山東”兩大集團說皆遭質疑，然欲尋此文書作者之天然同盟者，仍當遍求武曌全部之政治支持者，此事則似無可置疑。若干社會群體，利益未必盡同，然爲抗衡既得勢力，仍能結成聯盟。陣營之爭亦顯露於思想層面。其聯盟終使武曌所體現政治路向得以勝出。而於宗教領域，若干原爲宣傳之便而暫時徵用、與本文書所源出之群體思想有別的諸流派，或全或大部終在此局中敗北。筆者特別著重於第二章所考辨文獻作者之問題，原因正在於此。

[xx] 本書上編前兩章之論述，篇幅過長，謹向讀者致歉。本書論旨之論證本質上甚爲簡明，筆者原不欲多事盤桓。若不詳申前人諸說何以不可取，本書之論點或顯得近乎稚拙。縱然彼一文書爲宣傳之故，搬呈諸般思想形態，然不妨作者表達自身之理念。自 693 年後，中國出現空前諸般變局，標誌新型主權觀念之採納。是以筆者欲檢驗，此等變化是否直接肇因於文書作者之固有思想，於此政宣文獻是否有所表達，是否爲思想主旨。第三章之主題在於闡述文書之兩大旨趣——“武曌即轉輪王”與“武曌即菩薩”。

本書之下編幾乎將所有篇幅用於斯坦因編號 6502 寫本（S.6502）之譯注。前已言及，譯文之注腳皆爲呈其關鍵史實，缺之則文獻不獲詮釋。至於將文書中所寓諸種理念分別復歸於各自社會層面，並系統鋪陳其歷史背景，則有待來日承當。

本書所用之材料並不豐贍，其外尚有眾多文獻需語文學與史學之長時耐心之研索，本不宜妄作大端之論。然有限之辨析中亦浮現若干問題，筆者難按心緒，遂予初步迴應。尤所指者，在彌勒信仰；其作用類似“大同”“太平”觀念所激發之民間盛世理想。推之以往，若考察 S.6502 作者對“太平”俗願之利用，所得結論，或近乎筆者對彌勒與“化城”二

義之揣度。[5]

本書中所討論之大部分史料，原是筆者於 1971~1972、1972~1973 年間在那不勒斯東方大學（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）開設課程時，所 **[xxi]**
編纂之授課資料。前一年之大學課程中，余曾以法藏之《金獅子章》講述其學說。爲更準確地將法藏之思想還置於時代背景，余決意先深入考察武曌之佛教政策；然尋即遭遇《大雲經》之棘手問題，以及敦煌文書 S.2658 與 S.6502，此二寫卷者，本書有較詳盡之討論。

我謹向戴密微（Paul Demiéville）教授致以最深謝意。他仔細通讀了本書打字稿，並於 1975 年 12 月 16 日賜函五頁，滿載建議、訂正與思考，其中大部分載入本書腳注。然筆者之感謝並不限於此；戴密微教授在許多方面令我的研究工作更爲順遂。1972 年 6 月底及 1973 年 7 月余逗留巴黎一週，他慷慨允許余自由取用其豐盈藏書，且不遲疑以數種珍本書籍出借數月。此外，彼又展示其 1951~1952 及 1952~1953 年度於法蘭西公學院（Collège de France）之講義打字稿（參見 *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* 之摘要 , 1952 and 1953, pp. 212–213, 218–221）。這些關於唐代與武曌時期佛教之講稿，所論史料非常豐富，余用爲概述或通論，大有裨益。

筆者亦特別感謝法國遠東學院戴路德（Hubert Durt）先生，目前於京都正負責《法寶義林》（*Hōbōgirin*）之編訂；在其友善襄助下，所有中日文字由中村印刷所精審排印。在此，亦向該所中村社長（Nakamura Hiroyasu）致以謝意。亦不忘羅馬巴爾迪（Bardi）印刷所諸爲員工朋友，余於本書最後階段，約十五日之間與彼等合作，甚爲愉快。

我還要向英國圖書館理事會致意，特別是東方寫本與印本部之 H. G. H. Nelson 與 E. Anderson，兩位先生待余極爲友善，凡查閱諸多寫本、安排攝影，以及授權本書刊出影本，皆給予各種協助。

---

5 本書初版將“化城”英譯爲 Magic City，第二版改譯爲 Guidance City。

Elizabeth Davies 盡心處理英文表述，在此感激其惠。憶及與她並力解決英譯義大利文之諸疑難，頗感愉悅。

[xxii] 余妻莉拉（Lilla Maria Moramarco），雖校務家事紛繁，猶撥冗爲本書編制了索引。

最後感謝那不勒斯東方大學，不僅資助筆者在倫敦與巴黎兩地之短期研究，也承擔本書印製費用。

富安敦

羅馬，1976 年 9 月